

# 丁文江政治思想探析

李卫平, 周含华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丁文江主张社会平等, 反对资本主义剥削, 认同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 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平等。他的“好政府主义”和“新式独裁”的政治主张是以精英政治为基本内容的。丁文江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 反对暴力革命, 并提出了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改良方案。丁文江的政治思想有其局限性, 但也有其合理的方面。

关键词: 丁文江; 社会平等; 精英政治; 改良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6)03-0337-05

丁文江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 20世纪20年代“科玄之争”的主角, 也是二三十年代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和胡适一起先后主持创办了《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 并发表不少政论文。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 但除了“好政府主义”和“新式独裁”的主张外, 对丁文江的政治思想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深入了解丁文江的政治见解与政治倾向, 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 一、 社会平等的理想

“平等”, 是丁文江的基本政治价值观。他认为,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平等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深入人心的观念, 违反了这一历史潮流, 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决定了丁文江的政治态度。他批评资本主义, 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制度是完全不平等的”, 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所得的利润与劳动者所得的工资没有丝毫的公道的比例。富的越富, 穷的越穷”。劳动者还不能享受充分的教育, 政治不能参与, 法律不能享受, 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贡献”。他认同社会主义, 热忱地希望苏联这个“空前的大试验”能够成功, 相信“如果用苏俄的方法, 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提高, 生产和消费相均衡”。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 “西欧北美都要共产,

至少现行的资本制度要彻底改变, 快快走上平等的路去”<sup>[1]</sup>, 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他更认定共产主义“各尽各能, 各取所需”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丁文江对平等的追求, 是基于他的大众情怀。傅斯年评价丁文江: “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众方面的。”他的平等观是以英国功利主义为活水源头的。丁文江在英国留学时期好读书看报。傅斯年认为丁文江“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 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sup>[2]</sup>。边沁、穆勒是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丁文江在阐述他的政治信仰时强调, 善的行为是以有利于社会的情感为原动, 以科学知识为向导。他进而指出, 凡能够满足大多数人最大部分的欲望的行为, 就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这与功利主义的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包含着对广大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 对社会不平等的痛恨。

丁文江的平等观是当时思潮的反映。十七八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但由此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 这不仅违背起码的人道主义, 而且也会导致社会冲突与不稳定, 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 贫富悬殊, 保证社会起码的平等, 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丁文江对社会平等的追求, 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趋势。

丁文江赞成用共产的办法, 即由国家来“统治生

产的工具”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平等,而且希望苏联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平等的理想。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也是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认可的道路,即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但后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试图通过扩大政府职能和由国家掌握生产资料的办法来实现社会平等,固然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但由此将导致权力的集中和国家的干预,从而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平等构成威胁。而且,一旦国家垄断了大量资源,就不可排除个别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化公为私,从而形成新的不平等。对此丁文江是有所警觉的。他“极端怀疑”苏联的“自由”;质疑共产党执政后,在权力的腐蚀下“半路上未必不会走错的”;看到了权力所带来的不平等“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的生活是两样的”。尽管对此他没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但他提出的问题无疑是有远见的。

尽管丁文江把平等视为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但他的平等观并没有师承18世纪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强调权利的平等,即所有的人享受同等的自由和平等对待的权利,而不管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少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平民政治和西方的代议制一直“没有兴趣”。他更注重的是结果的平等,经济的平等,即“社会的待遇不可以太相悬殊”。他的平等观就显得过于偏狭。他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但忽略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其平等的理想多少有些虚幻。

## 二、精英政治的主张

丁文江的比较重要的政治主张有两个,一是“好政府主义”,一是“新式独裁”,这两个政治主张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精英政治。

丁文江最初提出精英政治的观点是在1919年,时值中国知识界正热衷于“社会改造”,并把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社会改造的灵丹妙药,丁文江却在《改造》上发表了《哲嗣学与谱蝶》一文,介绍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优生学。表面看来,这是一篇科普文章,但实际上是与当时时髦的“平民政治”思潮唱反调的。优生学认为人的天赋是不平等的,而且“改良人种根本的方法不是单讲社会教育可以做到”,他们把社会的发展寄托在少数优等人身上,认为“真正的进步只有靠在这个社会中优等人的后

代越来越多,而劣等人的后代越来越少”,正因为人的能力水平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因此,也就不可能大家都平等享有权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由优秀分子进行治理的思想,是优生学家们所推崇的。在介绍优生学这些观点的同时,丁文江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与这种思想是一致的,都倾向于选拔聪明才智的人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中国缙绅通过教育和进入仕途的垄断,始终掌握着对社会的领导权,这本身就是优生学理论的一种基本体现<sup>[31(64)]</sup>。1922年5月,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在第2期上,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中,胡适等人提出了“好政府”的政治主张,把“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消极方面是能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是一能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二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

在好政府的主张中,丁文江的精英政治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实际运用。他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为依据,认为大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的进步。他认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sup>[41]</sup>,从而夸大了少数精英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

正如胡适把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放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一样,丁文江把组织好政府、改良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他不但认为“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而且乐观地断言:“只要少数人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sup>[41]</sup>丁文江设想的好政府,就是以少数优秀人组成的好政府,从这个角度讲,好政府的主张,也就是精英政治的主张。

如何把少数优秀分子推上台,组成一个好政府?胡适、丁文江的答案是“少数人出来奋斗”。胡适认为,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丁文江则更鼓励少数优秀分子,以“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倒海的勇气”向政治上去努力,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这样,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sup>[41]</sup>。

那么,什么是“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呢?丁文江的标准是“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

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要保存“好人”的资格,消极的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是“躬行克己,把责备别人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sup>[4]</sup>。他理想中的好人是德才兼备,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能起而行道,接近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

1933年,丁文江在他的另一重要政治主张“新式独裁”中,进一步地发挥了精英政治的思想。

什么是“新式独裁”,丁文江的设想是: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材;四、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sup>[5]</sup>。显然,丁文江设想的新式独裁与旧式独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独裁首领的德、识、才上,新式独裁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精英式的独裁首领。是这样一个独裁首领与优秀分子的密切合作。说到底,新式独裁的核心仍然是精英政治,但其重心已由一打好人变成了独裁的领袖。

不过,与好政府主义主张中的好人相比,丁文江心目中的精英标准已发生了变化,“他们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主要是指专家和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官僚”;他们不再扮演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去激发国家的道德复兴,或为新的政治制度提供思想资源,而是介绍现有的技术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在他们手中掌握日益复杂的经济,工业、教育和财政的管理大权,正是由于这些管理,国家才能发挥其功能。”<sup>[3]</sup>

精英政治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在实际政治中,是很难让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力,理想的平等只能是权利的平等,即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如同柏林所说的“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尤其在现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对社会的深刻影响,由于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的职能越来越广泛,治国成为“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专家人才在管理国家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精英政治思想的产生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近代西方的精英政治观不仅主张让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支配着政治权力,认为他们是政治的核心,决定着政治的性质和社会的变迁,而且注重从制度上有效地节制

精英的权力,以防止权力精英为所欲为,专横滥权,注重从制度上保证精英的循环和流动,使权力真正掌握在有能力的人的手中。而丁文江的精英政治观恰恰缺少西方精英政治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设想的精英政治并无制度的依托。按照他的说法,“做首领的能把一国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政体是不成问题的”<sup>[5]</sup>。现代精英政治同时也是民主政治,而丁文江的精英政治则是独裁政治,这种独裁政治的现代化性质取决于独裁首领的个人道德。因此,他所追求的精英政治更多是儒家圣王政治的理想。儒家的圣王政治并未带来中国历史上的长治久安,丁文江设想的精英政治同样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 三、改良主义的立场

丁文江是主张从政治改革入手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他指出,改革政治不外乎两条路:一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时期内推翻原有的政府;一是用和平的手段,经过长期的奋斗,来取得政权。他反对武力革命,认为民国成立以来,一切革命都发生了同样的困难,这就是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效能,“凡要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人单占据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不发生任何效力”,加之中国地方太大,交通不便,割据的局面极不容易打破;旧的政府机关和组织,很少可以利用,新的统治一时难以代替旧的统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常有崩溃的危险”;中国军事教育落后,军事首领大多缺乏近代知识,没有干政的修养和觉悟。因此,革命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sup>[6]</sup>。

鉴于此,丁文江强调,“我们只好用和平的手段,经过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他先后提出两个改良方案。第一个是“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他试图通过“好人出来奋斗”,到北洋政府里去做官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这个主张被共产党指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1933年,丁文江又提出了在国民党执政之下实现“政治的和平改革”方案:第一,要求国民政府绝对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这是和平改革政治最重要的条件;第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国民党省市各党部的

费用,给各党以平等的待遇地位;第三,要求国民政府明白规定政权转移的程序,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sup>[5]</sup>。

同样,丁文江也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他明确表示,“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这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本身的严酷,“共产党式的革命在苏俄是极残酷的”,要牺牲数十万数百万人的性命;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成本太高。长期的战争会严重摧毁工业和文化设备,留给新政权的资本“不过剩了几根鸡肋了”。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sup>[1]</sup>。

丁文江也意识到统治阶级不会和平的把政权交出,政权的转移总是要经过剧烈的斗争,因而“不敢说不经过共产党式的革命,平等一定可以实现”,但又认为改良也有其可能性,既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和平地把政权由封建贵族的手里转移到中产阶级手里,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必和苏联一样通过革命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苏俄革命的成功是由于俄国特殊的国情,而西欧北美的国家“中产阶级的组织远不是旧俄可比”,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武装的劳动阶级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鉴于上述原因,他主张通过别的途径来实行共产主义,求经济平等,至少要等别的途径都走不通再从事于暴动。改良主义也就成为丁文江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方式<sup>[1]</sup>。

改良主义也决定丁文江的政治态度。丁文江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但他表示,“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力量,当然不愿意推翻它。”<sup>[6]</sup>丁文江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同情和理解。他表示,假如他是二十岁,他也要加入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贪污暴政、苛捐重税造成的,反对国民党把共产党当成“匪”,进行围剿屠杀,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给共产党宣传其政治主张的自由。但他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更不容易走得通,一是革命的心理没有完全成熟,尽管中国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希望均田,但还是希望和平,不愿承受均田而引起长期内战的痛苦,人民也因为历年受内战的痛苦,没有再愿意继续革命的;二是“目前的外患”,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如果革命的内战继续发生,中国无法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国际上也会发生不利的影

响,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暴力革命的政策,走和平改革的道路<sup>[1]</sup>。

丁文江的第一个改良主义实践破产,而被丁文江视为“中国政治的出路”的第二个方案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不了了之。虽然屡屡受挫,但丁文江始终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里,面对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是不可能进行改良的。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走不通的。

中国近代的革命,同样由于当时中国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旧的制度被推翻了,新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内乱。丁文江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近代革命所面临的困境。他呼吁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的局势下放弃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大多数中国人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

革命与改良,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两种方式。一般来说,革命摧枯拉朽,轰轰烈烈,能较彻底革故鼎新,但也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的动荡,而且改良较之革命,代价更小,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主要的是采取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改良来实现的。诚如丁文江所言,“人类的进步除了长期的继续努力之外”,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我们不能指望一次成功的革命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我们还必须,也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来逐步地完善社会制度,来解决现实提出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良更加重要。

丁文江的政治思想在三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他们服膺西方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又不得不屈从中国现实的条件;他们崇尚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进步,又向往社会主义的平等与活力;他们不满现状,但又不希望破坏社会秩序。这一切,使得他们的思想呈现繁杂多变的特点。丁文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与彷徨。

#### 参考文献:

- [1] 丁文江. 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J]. 独立评论, 1933, 5(51): 2-5.
- [2] 傅斯年. 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J]. 独立评论, 1936, 2(189): 7-12.
- [3] 夏绿蒂·弗恩. 丁文江. 科学与中国新文化[M]. 长沙: 湖南

科技出版社, 1987:

4[ J ]7.

[4] 丁文江. 少数人的责任[ J]. 努力周报, 1923, 8(67): 2-6.

[6] 丁文江. 中国政治的出路[ J]. 独立评论, 1932, 7(11): 2-6

[5] 丁文江.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J]. 独立评论, 1934, 12(133):

## An analysis of Wenjang Ding's politics thought

LI Weiping, ZHOU Hanhua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enjang Ding hold the equality in society, objected to exploitation in capitalism and stood for the value in communism. He expected the equality in society would come true in communism. His political opinion about "A Good Government" and "New Dictatorship" was based on the "elite politics". Ding believed that equality in society could be realized by way of reform instead of revolution. He also suggested some ways to solve the domestic social problems. Ding's political thought should be valued in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ways.

Key words: Wenjang Ding; equal of social; essence politics; reformist

[编辑:颜关明]